

秦大我

個人簡介

1924年生於惠州。六歲時，入讀家鄉昌明小學，後轉讀到州市立第七十小學和第六十六小學。十二歲，日軍來襲，逃回家鄉，於惠州縣一中讀初中一年級。1938年，廣州淪陷，隨母親到韶關投靠父親，後被送往兒童訓練團，並先後於實驗中學、志銳中學及國立第三華僑中學讀書。在第三僑中，因舉辦讀書會，被國民黨關進韶關帽子峰監倉。獲釋後，報考黃埔軍校。1942年，被編入第十九期炮兵科。後逃到重慶，考入交通大學造船系。1943年底，獲選拔到重慶江北魚雷營訓練，並赴英國學習維修雷達。1947年，回到中國，任李漢魂副官。1949年後，曾入英德勞改場。秦先生師承父親秦弇生的書法篆刻，創秦體字。2014年在廣州逝世，享年91歲。

童年生活

1924年，我在惠州出生。六歲時，入讀家鄉昌明小學。七歲負笈廣州，先後入讀市立第七十小學和第六十六小學。畢業前，日本仔來襲。那時我逃回鄉下，後在惠州縣一中讀初中一年級。那年我十二歲。

我從小就是愛冒險的人。記得讀第七十小學時，我經常和同學捉迷藏。有一次，七、八個同學追著我，我跑上二樓，他們又來包圍我。於是，我爬上陽臺花幾，對他們說：「來啊，追上來算你叻。」¹大家都是小孩子，沒頭沒腦，人家說追，他們便追。最後，趕狗入窮巷，我無路可退，就從二樓跳下去，卻不幸撞上柱子。砰的一聲，我便頭破血流。當時爸爸在七十小學當老師，他和校長、老師、校醫得悉後趕來。「不得了！」他們看我的樣子，似乎命不久矣，便趕緊送我去搶救。不過，我總算命大，一個月不夠就痊癒了，還可以上學，和同學玩耍。還有一次，我跟體育老師去游泳。我蹲在欄杆上，看同學高興地玩耍。那位體育老師可真膽大，竟在後面用力踢我的屁股，害得我掉進水裡。想不到，我就這樣學會了游泳。

兒童訓練團

1938年廣州淪陷，我跟隨母親避難。那時我們在惠州有生計問題，決定遷到韶關投靠父親。父親當時是抗日戰爭動員委員會科長，經常忙於抗日動員工作，無法照顧我和母親，故將我們安置在風度路的動員書店。於是，我們就寄居在書店樓上的小閣樓裡。由於家裡兄弟

¹ 叻為廣東俗語，厲害的意思。

姐妹多，生活非常困難。後來爸爸得悉廣東省政府組織了一個戰時兒童訓練團，縱使我已十二歲，他也迫於無奈，在得到局方同意後，便把我送去訓練團。

當時訓練團的團長吳菊芳、中隊長達瑞如，還有張潔芳，她們均把我們這些小孩子照顧得很好。例如她們會教我們抗日知識和民族英雄事蹟，又介紹相關書籍，還提供初級軍事訓練。由於時局變化迅速，加上難童日益增多，吳菊芳徵得中央賑濟委員會同意後，將訓練團改組為兒童教養院，把我們這批訓練團的孩子全部撥進兒教院。當時人數不多，沒有分第一院和第二院。後來人數逐漸多了，才相繼成立一院、二院、三院等，最後開設七間教養院。我入住一院，後來時局緊張，便隨一院遷到星子去。

那時政府為了宣傳抗日，在我們中間召集了二十八名少年兒童，成立戰地服務委員會的少年兒童隊。我們由星子出發，一路坐船到英德、清遠、花縣等地，進行戰地服務。我們二十八人坐著小木船，男同學在一邊，女同學在另一邊，大家腳撐著腳，在船上睡覺。澤麗璋擔任領隊老師，他後來成了畫家，並在香港創辦了「五十年代劇社」。上岸後，澤老師每天晨呼，領我們起床排隊，在外面喊口號，唱革命歌曲，並動員當地群眾抗日。記得他喊道：「不要渙散，一定要團結，不怕犧牲，為國家、為自己家鄉的安全，起來抗日！」中午時，我們經常做街頭劇和唱革命歌曲。我最記得演過一齣劇，叫「放下你的鞭子」。²我演兒子，劇中的母親拿著藤鞭，強迫我參加戰爭，故事很悲慘！我們演得很逼真，一邊演一邊流淚，觀眾在旁邊吆喝道：「不要打他啊！」後來，我從兒教院轉到實驗中學去。

實驗中學

實驗中學時，我們這十幾名訓練班的同學，可算是兒教院的招牌。每逢有政府中央人士或華僑參觀兒教院，我們都會出來表演。其他同學沒有肥皂，我們每人則有一塊；別人沒有鞋子，我們卻有。我們也很爭氣，所以吳菊芳院長間或在操場講話時，也提及我們：「這些是我的得意弟子，跟自己兒子一樣。」那時李湏才十歲、八歲，³我們比她大十歲左右，整天帶著她到處玩。後來我覺得實驗中學不是很理想，所以停學了幾個月。

² 《放下你的鞭子》原為田漢據德國作家歌德小說改編的獨幕劇。1931年，陳鯉庭再改編為抗戰街頭劇，為戰時廣受歡迎的話劇。

³ 李湏為李漢魂將軍和吳菊芳院長的長女，1933年生，因為湏江從廣東北部流下，故名之。見李湏《花開夢懷》，汕頭大學出版社，2004年，頁59。

那時爸爸見我東不成西不就，便跟志銳中學聯繫，⁴結果志銳中學取錄了我。不過，我並非正規學生，而是唯一的「工讀生」。我一邊讀書，一邊在學校幫忙。我在學校寄宿，負責兩項工作：第一，為學校上課、下課和起居膳食搖鈴。那時我掛著鬧鐘，拿著搖鈴，坐在課室最後一排，對著門口，方便出入。下課時，我走出門口，圍繞學校搖鈴，記得那鈴聲很響亮。第二，每天約五點起床，打掃校務處，又煮開水，給每位老師斟茶；晚上休息時，我才做作業。那時的生活，較為艱苦。

記得有一次，我幫老師油印試卷。學校印試卷很嚴謹，一定要有老師在場檢查，才能啟封油印，印好一疊，便立刻封存。那時人手不夠，老師問我：「你會不會油印？」我說會，於是幫他油印試題，怎料考試結束後就發生問題。學校教務主任問我如何處理試題，我交代後，他說有人檢舉我，說我偷賣試題。我否認這事，說自己只管操作，而且當時有老師在場監督封存工作，全部試卷封存好才可帶走，所以根本不可能偷試題給同學。我跟他爭論，校長楊瑜要捉我去禁閉和寫反省書。我不服，大家吵得很厲害，後來他說要我停學。我想，反正是工讀生，生活那麼艱苦，不讀也罷。結果我主動停學回家，回家後卻無所事事。父親拿我沒法，不明白我想怎麼樣，讀這讀那都不成。

第三華僑中學

後來父親請求國立第三華僑中學的校長，⁵讓我做插班生。僑三中在樂昌縣楊溪村，學生大多是港澳子弟。他們經常講英語，搞到我們本地同學一頭霧水，後來接觸多了，大家才能溝通，我也學會一些英語會話技巧。

說起來，爸爸的誼子、我的誼兄陳原，在中山大學外語系畢業，通曉六國文字。誼兄特別欣賞蘇聯文學，又是一名共產黨地下組織成員。他和音樂學院畢業的妻子翻譯了許多蘇聯歌曲。那時他經常送我進步書籍、報紙及歌曲，我就拿它們回學校閱讀和歌唱。同學很感興趣，與我組織了一個讀書會，共有二十多人參加，學習材料則由誼兄提供。課餘時辦的讀書會，怎料被國民黨十二集團軍餘漢謀的部隊發現。他們說學校裡有共產黨外圍組織，結果包圍學校進行搜查。那時我們睡上、下層床，上床的同學告訴我：「好好注意啊，人家來搜查學校，說要通緝異黨份子。」我們懷疑此事可能與讀書會有關，便疏散所有同學。我要處理讀

⁴ 志銳中學原稱建國中學。1931年由張天爵先生在廣州創辦。1937年，更名為志銳中學，以紀念國民革命軍第四軍師長許志銳。1938年，廣州淪陷，學校解散。1939年12月15日，張發奎在始興縣復校，出任名譽董事長，李漢魂將軍任副董事長，張天爵則任校長。

⁵ 抗戰時華僑陸續回國，並集中在廣東。1942年4月，教育部籌辦國立第三華僑中學。原以樂昌縣楊溪安口村益昌油坊為校舍，後因戰事遷往連縣。

書會的文件和報紙，結果走得較遲，被捉住了。我被關進韶關帽子峰的特別監倉，一關就十個月。當時我才十五、六歲。

監倉採用封閉式管理，監禁期間曾開庭審我數次。其實沒有正式開庭，只是關我在一間房間裡，審問我組織的情況，例如誰是後台、成立源起、會員情況等等。我說是在書攤看見一些刊物，覺得有趣，便買回來看而已。那時我撇開一切有關聯的人，獨自承擔。三個月後，我偷偷拿了支鉛筆頭，在卷煙紙上寫了幾個字，交給監獄員。我說：「無論如何，千方百計，請幫我送給父親。」父親真的收到了，那時他才明白一切。原來父親曾去學校，問我為何幾個月沒有回家，可是學校封閉了消息，直到收到我的紙條後才明白。後來他拜託十二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林楚君，到監倉瞭解我的情況。父親在紙上寫了一句話贈我——有文天祥之正氣，神鬼不能欺也！他叫我好好體會這句話。它對我的人生影響很大，從此我深信有文天祥的正氣，便不會做損害國家和人民利益的事，任何歪風邪氣也打不倒我。

獨立監倉的條件很差，每天只提供一口盅的開水，⁶漱口、洗臉、飲用全是這盅水了。那時我經常沒水喝，十分口渴。飯是一大碗，但上面只鋪了幾塊蘿蔔乾，又沒有鹽，飽不飽也沒有人管。我沒有放風的機會，見不到陽光，且天天如此，害得我全身長滿蝨子，臉又黃又腫。但是，我在那裡卻學會下象棋。在獨立監倉，住在我隔壁的是一名國民黨海軍司令。他撿起瓦片，叫我磨成圓形，然後在地上畫一個棋盤。就這樣，我在這邊，他在那邊，大家便下棋來。

我堅持了十個月，國民黨仍未落案，最後唯有釋放我。當時他們讓我在判決書上簽名了事，判決書很荒謬，只寫了八個字——年幼無知，輕舉妄動。

黃埔軍校

離開監獄時，父親來接我。出來後，我剃光頭髮，把爬滿蝨子的衣服換掉，休息了近兩個月。那時適逢黃埔軍校招生，所謂「國家興亡，匹夫有責」，國家正值多難，我希望投筆從戎，當一名真正的軍人，保衛國家。招生要求年滿十八歲，且高中畢業。我當時才十七歲，不夠年齡，又不是高中畢業，於是回到僑三中。由於校長和我爸爸相熟，通過私人關係，我拿到高中肄業證書。我拿著證書，報大一歲，便去報考黃埔軍校。真奇怪，檢查體格時，我竟然過關。也許因我休息了兩個月，身體慢慢恢復，加上我個子高，身材又好，所以合格了。

⁶ 口盅為廣東俗語，指漱口缸。

然後是口試和筆試，筆試考語文、英語、數學。記得英文考試，須把孫中山先生遺囑翻譯為英文。我剛好在學校譯過，所以很快就完成了。同時，我愛寫散文、小品等，所以語文考試又通關。數學也基本合格，所以我最後獲取錄了。

1942年，我被編入黃埔軍校第十九期炮兵科，⁷這期共有兩百多名學員，全部送往貴州獨山集訓。我們先從韶關坐火車到桂林，再轉乘汽車去獨山，花了許多天時間才到達。在黃埔軍校時，我帶領一個班九位同學上山砍竹、砍柴，用以建設校舍，用了三個月時間。回來後中隊長召我去問話，說有人告發我帶了一班學員去偷老百姓的雞。我否認此事，說我們在山上很守規矩，老百姓對我們很熱情，用不著去偷，更請他上山調查，以得出真相。但是他不相信，指有人證物證。如是，又捉我去禁閉，結果關了三個月。他要我反省和寫檢討書。我非常不服，極力反抗。最後分隊長到禁閉室拉我出來，當著炮兵連的戰士和同學，要我跪著審問。營房門口剛好有一枝擔竿，我出來時拿起那枝擔竿就和分隊長打起來，他被我打斷了腰骨。結果他指我行兇，毆打軍官，我得了這個罪名，就被勒令退學。

我在獨山無親無故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剛好遇到一位廣東語文教官鄒堅白，他那時也是單身漢，便對我說：「大我，你這麼艱難，不如到我那裡幫忙煮飯。」我答應了，想這樣也好，有飯吃有地方落腳，以後有機會的時候，再打算吧。我在那裡逗留了一個星期，替他煮飯、洗衣服及做家務等。後來我想這樣下去不是辦法，須另謀出路。於是，他又介紹我去當地的民生醬油店打工。我在醬油店工作，每天擔一缸醬油到處派送，哪間要貨，便送去那裡。除了送醬油，師傅也教我製醬油。後來有個湖南綢緞布匹店老闆，是大戶人家，逃亡到獨山，住在醬油店不多遠的地方。他的女兒讀初中，沒人輔導，知道我有文化，就希望我幫忙。我答應他，說互相學習吧。這樣我一邊在醬油店工作，一面輔導學生，一邊又看書學習科學和文化。一段時間後，知識增長了，自己也獲益良多。

後來過年，我的鞋子剛好破了，便跟醬油店的老闆說：「過年了，我想支些錢，買一雙鞋子。」但老闆非常刻薄，竟然跟我說有飯吃就好，還想穿鞋？那時我血氣方剛，受不了這氣，便跟他說：「我辛辛苦苦為你服務，替你賺錢，只想支錢買雙鞋子過年，你卻說風涼話。」於是無名火起，便拿著秤砣和老闆打起來，結果醬油店的缸瓦被我們打破了。打架過後，我收拾包袱便走。這時我又回去找鄒教官，他收留我暫住一會兒。他待我不薄，非常信任我。

⁷ 秦先生回憶時說 1940年考入黃埔軍校，應為誤記。黃埔軍校十九期學生實於 1942年 5月入伍，分為步兵、騎兵、炮兵、工兵、特別班、輜重兵和特別兵七個科。編者此處把年份更正為 1942年。

搜索連

天無絕人之路，此話非虛。那時政府開始號召青年加入遠征軍，即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。」⁸我想這也是出路，也是抗日，於是便去報考。填寫履歷後，負責人叫我明天報到。我想我完全符合要求，所以才馬上獲錄取。第二天，我去報到，被分配到二〇二師六〇五團搜索連。那天之後，便開始訓練，學養馬和馬術。那些馬全是山東野馬。開始時，我常被馬踢。記得從前在樂昌，叔叔是軍訓團的政治指導員。他那裡有馬，我也曾騎過，但那時有人牽著馬，跟現在不同。

在搜索連一、兩個月後，我碰到了兩位僑三中的同學，一位叫做彭仲文。聊天時，他說有個親戚在重慶，有點地位，而在這裡當兵，是出不了頭的；既然前途渺茫，不如想辦法去重慶。大家商量好了，決定荷槍實彈，全副武裝，夜半三更當逃兵。如果別人問起，我們就說去執行特殊任務。這樣我們在馬房各自挑了一匹好馬，背著衝鋒槍，連夜開始「搜索任務」。我們大多數時間是在夜裡趕路，走的是山道，依靠指南針辨別方向。由貴陽經陳家崗到重慶，我們足足跑了五天。

重慶

我們到達重慶邊界綦江，剛好碰上趕集。我們想，既然不能牽著馬進重慶，不如趁趕集把三匹馬賣掉。但是軍馬的大腿上有火印，若被人發現，知道那是軍用馬，決不會買。所以我們借來筆墨，在大塊的白布和白紙上寫著「良馬出售」，將它貼在火印的位置。街上的人見到，也說是好馬。我們開價三千大洋一匹，討價還價後，每匹以一千大洋成交，那時一千大洋約等於現在的一萬元。那衝鋒槍、子彈和軍服又怎樣處理呢？我們把槍、子彈等扔進農村的魚塘，再拿賣馬的錢買套老百姓的衣服，把脫下來的軍服捆起來，然後扔掉。這樣我們變成了老百姓，進入重慶。

豈料我們用了兩天也找不到那同學的親戚，原來他已調離重慶。我們三人頓時變得無親無故。因為錢來之不易，我們也捨不得住旅店，就在公園的六角亭過夜，總之能省則省。公園的六角亭雖有石桌和石凳，但刮風下雨卻無處可避，只好在那裡淋雨。唉！風涼水冷，可真淒涼。那時重慶有很多報紙欄，我們每天一早便到街頭看報紙，看哪裡招工和招生，想找

⁸ 青年遠征軍，簡稱「青年軍」，為一支以知識青年為主的部隊。1944年，國民政府為了在中國戰區儲備反攻力量，號召全國知識青年參軍入伍，組成青年遠征軍。它共有9個師，即201師至209師。

出路。雖說國民黨腐敗，但它有一個優點，就是在重慶市成立了一個失學失業青年救濟委員會。我們拿著那張肄業證書，就像得到護身符一樣，到青年救濟委員會那裡瞭解情況，希望得到照顧。那裡的人給我們一些表格，要我們填寫。有個姓吳的主任，看完我的資料後，說：「惠州姓秦沒幾個，我在惠州女子師範讀書的時候，有個同學姓秦，不知和你有沒有關係？」我問叫甚麼名字，她說叫做秦佩濃，我說是我親姑姑。她說原來是你姑姑啊，那麼不要叫她主任，叫她姑姑好了。那真是異地遇故人！她立刻派發棉被、衣服給我們，又每個月給我十二元生活費。這樣我住進宿舍，逗留了差不多兩個星期。

交通大學

不久，她問我想升學還是想就業，我說若有機會就升學，如果確實無法升學，那只好就業。她知道我想升學，就建議我去她丈夫那裡的大學進修班。我同意去進修，那兩個同學就選擇就業，於是我們分開了。

我在大學進修班讀了三個月，剛好大學招考，但要有保證人。我找姑姑幫忙，她找了丈夫當我的保證人。姑丈在教育部裡當科長，有資格擔保我。那時候我認為機會很渺茫，因為我初中、高中還未畢業，卻要考大學，真是破天荒的事情。我報了三所大學，一是中央政治大學，一是重慶大學，最後是重慶的交通大學。報考中央政治大學，是因為它百分之九十的畢業生都能當上縣長。如果畢業後，我能當上縣長，一定會做個模範清官，把這個縣治理好，治安和民生都會有所改善。然而，放榜時收到通知書，叫我到交通大學報到和註冊。那時我想，不管甚麼大學，總算考上了。交通大學在重慶陳家崗。到了選科的時候，覺得自己的物理、數學還算過關，而投身造船業，改革國家的海上交通，還是有一定前途的。所以，我就選擇了造船系。

怎知好事接踵而來。過了一個學期，即 1943 年底，中央政府到造船系選拔一批知識青年加入「護英接艦參戰海軍大隊」，以遠赴英國接收軍艦。當時政府要求學員樣貌端正、身材好，走路儀態又要端方，最後還要通過體力試驗、文化考試和口試，方能獲選。當時有三、四名學員獲選，我是其中一位。考取後，我們到重慶江北魚雷營報到，我被編進第一中隊。全隊共三百人，來自全國各地，大家集中起來等消息。學員日間進行軍事操練，又上軍事常識課，還要學習吃西餐的禮儀。我素常最「反動」，教官說吃西餐一定要左手拿叉、右手拿刀，說這是規矩。我反說不一定，有許多人是左撇子，左手拿刀的。教官卻說不對，一定要我照規定去做。我又反駁說常規是這樣，但不能框住別人，若剛好有人是左撇子，那怎麼辦呢？由此，

那些教官認為我太「反動」。

在海軍期間，我曾遇上一次驚險的意外。那天北風呼呼，我穿著棉衣棉褲，戴著棉帽子，從江北坐搖櫓船到重慶。我仗著自己懂游泳，不怕死，竟然站在船邊。上船的人很多，他們擠擠撞撞，結果不小心把我碰倒，害我掉進長江。長江水急，我身上的棉質衣物一沾水就變重，導致身體迅速往下沉。我一邊游泳，一邊脫衣服，最後只剩下內衣。水流把我從揚子江沖到嘉陵江，在交匯處剛好有個漩渦，把我拉進水底。我還算醒目，⁹在水底時兩腳一蹬，就浮上水面，然後趕緊吸氣。但水流湍急，我疾旋幾圈後，便暈過去了。最後隨著水流，漂到一個沙灘上。剛好有個農民到河邊挑水，看見有個小夥子赤條條地伏在沙灘上，就上前一摸，發現仍有氣息，便連水也不挑，背著我回家去。他為我熬薑湯，蓋棉被。後來我蘇醒過來，他就問我情況，又通知海軍部隊把我領回去。那次死裡逃生，真是感謝那位恩人！

英國受訓

經過三個月的訓練，我成為第一批出國的海軍學員。那次是我第一次離開中國。我們先從重慶機場飛往加爾各答，再坐船經紅海、蘇伊士運河，到英國的普利茅斯軍港，前後花了二十天。抵達後，我們就集中訓練和分班，英國中士擔任領班，即我們的班長。我在英國仍用 Tai-o（大我）這個名字。英國教官給我們上課，先教機器內部操作，後教維修。雖然在學校有機會讀英語和練習會話，但因為不適應英國的地方語言，「聾啞」了差不多一個月。其實英國跟中國一樣，有不同方言，故此發音也要慢慢掌握。記得當時教官以英語教學，但有一名專員幫忙翻譯。因為我們已有海軍訓練的基礎，不少內容已經學過，後來選科時，我在槍炮科、魚雷科、輪機科和雷達科中，選了輪機科。除了學輪機，我也兼學雷達、通訊、槍炮的知識。

當時中國水手到英國，華僑表現得很熱情，非常關照我們。他們帶我們到處參觀，瞭解風土人情，讓我們慢慢熟悉環境。我們的待遇很好，每月有四十英鎊，國內另有六十元津貼，由家屬領取。但我沒有餘錢，因為我想學雷達，但那個教雷達的教官非常保守，只教我們使用，不教維修。如果要學維修，只得靠他，不然就只有「半桶水」。那時我想了一個策略，就是投其所好，每逢星期六、日，他喜歡做甚麼，我就陪他做甚麼，費用全由我承擔。於是，我和教官做了好朋友。我常把雷達弄壞，然後請他教我修理。後來，我更把機器拆開，然後學懂維修的方法。於是，每個月四十英鎊就全用來「交學費」，但我就學到了一套本領。由此

⁹ 醒目為廣東俗語，指機敏。

可見，我的人生觀就是「要麼不學，要學就要學通」。

一年多的訓練，終於結束。1947年，我們乘「重慶號」回中國。¹⁰這艘軍艦由英國製造，排水量達五千五噸，全長一百五十多公尺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曾受過戰火洗禮。修好後，剛好中國要擴大海軍和加強海軍力量，英國便送出「重慶號」和「靈浦號」兩艘軍艦給中國政府。

蔣介石計劃讓這艘軍艦參加淮海戰役，但我們認為中國人打中國人，完全沒意思。如果打日本仔，我義不容辭，但是打內戰，兄弟打兄弟，我們就不願意。於是，我們偷偷向北駛向葫蘆島，國民黨認為我們是策動起義，要把軍艦給共產黨，結果就派飛機來炸軍艦。當時重慶號尾部一角被炸損了，由於怕它全部被炸毀，鄧兆祥艦長下令拔開水閘，讓船身注水，最後重慶號在葫蘆島附近的碼頭沉沒了。1953年，它被打撈上來，當年蘇聯老大哥說我們沒有能力修理，要幫忙維修，但其實他出賣我們，將船上所有的精密儀器都搬回蘇聯，最後只剩下空殼。這樣沒辦法再用，船艦只好拿來做倉庫。唉！一艘如此先進的軍艦，就變成倉庫，大躍進時期，還被拆去大煉鋼呢。至於「靈浦號」，英國怕也被國民黨炸毀，就把它收回，沒有給國民黨。

回到廣東

戰後李漢魂將軍閒居上海，我剛好也在上海，每個禮拜都去探望他。他家經常辦宴會，邀請李宗仁、陳濟棠、鄧同來等人物去吃飯和喝酒，而我也當上陪客。客人在座的時候，他搭著我肩膀向人介紹，說我是他的得意學生，又是他契仔。所以，很多人認為我就是李漢魂的契仔。我覺得很光榮，有這麼好的父親。後來我離開上海，他也離開了上海。我回廣東後，知道他也回廣州，當上廣州市內政部部长。身為兒子，我當然去探望他。他問我現在做甚麼工作，我說當上了海軍炮艇艇長。誰知第二天，他跟我說不要再當炮艇艇長，回來跟他就好。我跟他說是否當他的勤務兵，每日倒茶倒水，李漢魂說已有武裝副官，卻沒有文職副官，叫我回來幫他。我說如是便要整天跟著他，開會要去，睡覺時又要守著。沒想到，他說：「我身邊還有甚麼人可以信任呢？」既然如此，他一定要我回來幫他，我就辭去炮艇的工作，留在李漢魂身邊。

於是，我住進他東山新河浦的別墅。那所別墅有一堵大圍牆，裡面有三座洋房。他睡那

¹⁰ 重慶號，原名為阿羅拉號。1948年5月，英國贈送此軍艦給國民政府，亦為國民黨當時最強大的主力戰艦。

邊的房間，我睡這邊的房間，他的起居飲食，差不多全由我安排。我曾問李滇：「你知不知道你老爸最喜歡吃甚麼？」她說不是很瞭解。我說：「你老爸最愛吃螞蟥醬。」它的製法是把螞蟥捉回來，連殼連腳攪碎，然後以油、鹽、薑、醋醃制，放進罐子裡，然後挖一個洞，把它藏起來，兩三個月後挖出來開封。那股香味啊，香噴噴的！這種螞蟥醬能清油膩，化油很厲害。李將軍每一頓飯都要吃，有時我沒有準備，他就會問為甚麼這頓飯沒有螞蟥醬。李將軍很瘦，飯菜都是鹹魚、青菜、豆腐、魚、肉等。

我一直當他的副官，直到他去美國。送他到香港時，他就跟我說：「我在香港落腳後，就接你來香港。」後來，他派武裝副官鄧貴南來廣州找我，鄧副官跟他的日子很長，在李將軍當師長的時候就開始當他的副官，和他很親密。當時我考慮父母還在，整天在外始終沒有家庭溫暖，就決定留在國內，沒有跟隨他去了。

1982年，李將軍離國後第一次從美國回來，住在廣東迎賓館。我聽到消息立刻去見他，他說：「我沒有幫你做些甚麼，給你一百元買東西吃吧。」那時候，一百元美金價值很高。他第二次回來，我寫了一、兩幅字贈他。

書法藝術

從小我就練書法，父親常說字如衣冠¹¹，寫一手好字，等於穿上一套好衣服。如果連字也寫不好，就等於衣服歪歪斜斜，見不得人；別人沒心情看你的字，你也得不到預期結果。所以，他要我一定練好書法。他還說從前科舉的主考官，不是看你的文章，而是先看你的字；拿試卷一看，如果字能吸引他，他就會從頭到尾把文章看一遍，如果字寫得不好，他就把試卷扔到一旁，即使文章寫得字字珠璣、精彩絕倫，但字吸引不了他，還是被棄掉。故此，他要我一定要寫好字，這樣謀生也更容易。

開始練字時，是描紅和填格。筆劃寫歪了，爸爸便要重新寫過。於是，從小時候便培養了寫書法的興趣，後來一點一滴積累經驗。書法不能靠三個月速成班，要以整個人生來學習和修煉。戰爭那幾年，我在軍校寫黑板報、大字報。文革期間，我在鄉下被監督勞動，報稱自己是文盲，平日不敢公開看報和讀書；別人在黑板上寫的文章，從不敢看；別人做報告，我也不參與。有一次，我被趕到水上運輸社當船工，運輸社要寫一幅大橫額「歡送知識青年

¹¹ 秦先生父親秦畧生(1900--1990)為中國著名書法家和秦派書法創始人，歷任廣東文史館副館長、中國書法家協會廣東分會主席。秦先生自努隨父習書法和篆刻，並鑽研歷代名家碑帖和秦漢印譜，在爨寶子碑、大小篆及天發神識碑等基礎上，開創自己的特點和風格的字體。秦先生並以其獨有的秦體字，為「秦畧生故居」題名。

上山下鄉」，請一位醫生幫忙。那位醫生和我投緣，知道我的底細。他就請我代寫。我怕被識穿，不敢寫，他便叫我回家寫，完成後偷偷拿回來，就當他寫。我看在友誼份上，便在一塊大紅布上揮筆書寫，第二天交給他，後來掛了出來。大家說那個醫生的字，原來這麼漂亮！最後，書記還是發現了。廠長叫我到辦公室，要我老老實實，坦白交代。又說我隱瞞歷史，原來是高級知識分子，字寫得好，卻說是醫生寫的。結果他不要我做船工，調我回來辦公室幫忙寫東西，又叫我以後不要亂報歷史。這次，我因禍得福了。

解放後，我受到運動衝擊，因為自己太忠厚、直率，對政府提出許多意見，得到「右派」、「極右分子」的帽子。他們說我反黨、反社會主義、反人民。我在英德勞改場，勞改了二十年。那時我有個看法，就是整個社會是一個舞臺，掌握權力的人是導演，下麵的人全是演員。導演要你扮演甚麼角色，你就扮演甚麼角色；要你扮乞丐，你就成了乞丐的樣子；要你扮當官的，你就扮成官；要你扮勞改犯，你就像勞改犯。當時我被調派去運礦，每星期開會評表現，我必被評為下游。因為要挑擔一百五十斤以上的礦石才能達到上游，而我只能承擔六十斤。不過，這種評核也激發了我。我不甘落後，每天早上五點起床，拿兩個籬筐裝上幾塊大石，然後稱重，夠一百斤了，就送回來。就這樣，我來來回回地走，從中鍛煉自己，籬筐裡的石頭也越加沉重。幾個月後，我就挑到二百二十斤，遠超一百五十斤了。後來，我被調去燒石灰。最初只做徒工，但我很認真，學懂如何掌握火候、如何在結窯的時候擺石頭、如何留下火爐……後來我研究通透，就當上了石灰師傅。

在勞改場被人監督勞動，我失去自由，但可以體會到許多書本上沒有的社會知識。譬如榨糖，本來一百斤的蔗可以榨出十斤糖，但我有辦法把一百斤的蔗榨出十一斤糖，比原來多了一斤。那麼，一萬斤蔗，我就可以榨出一千一百斤糖，絕對超產。當時那裡有甚麼事，人家就來找秦大我。在勞改場，我不過是勞改犯的角色，是整個社會上的一員。但如果演好他，我就是第一了。憑著這種信念，我今天成為了書法家。我從沒打算做書法家，但父親是世界著名的書法家，我當他兒子，就不能丟父親的臉，所以我也拼命去學，最後也學通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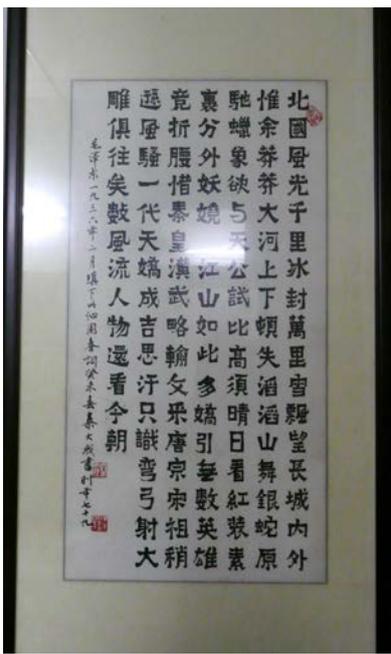
總的來說，這種意志力，歸根結底是在兒教院當小孩子時，從集體生活中鍛煉出來的。在戰地服務時沒水喝，我們就撿拾日本仔的鋼盔，拿沙洗乾淨，然後在下麵放磚頭燒水。這種從小培養的獨立生活精神，現在一般家庭的兒童是沒有的。我們這些從戰爭走出來的孩子，卻有股獨立強毅的生命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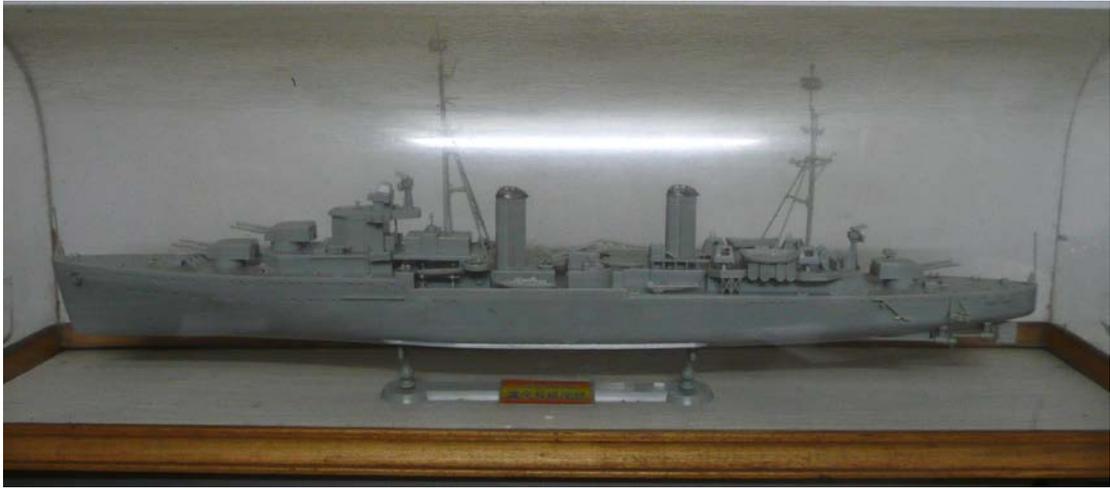
秦大我 (2009, 廣州)



1947年夏黃浦江光強砲艇，時秦先生任職艇長



秦體字



秦先生珍藏重慶號巡洋艦模型